

希臘文明中的意識形態 —論尤里皮底思的悲劇與他者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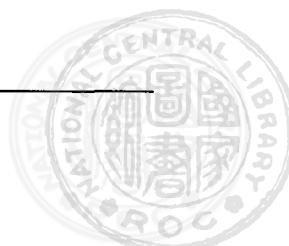
倪淑蘭*

摘要

傳統的戲劇研究通常以型式結構的角度研究希臘悲劇，也就是以亞里斯多德式的方法分析該劇的六大要素：情節、人物、思想、語言、音樂以及場景。通常這樣的方式在於發現劇中的主旨，而且藉由此展示希臘悲劇正面的影響力。也就是使得觀眾經由洗滌獲得智慧，也因此，希臘悲劇被視為該文化的結晶，呈現出其崇尚理性的一面，而這樣的特質也成為後來整個西方文化的主要表徵之一。然而，隨著西方現代戲劇的出現，理性以及高貴人物的理念開始受到挑戰，例如荒謬戲劇劇作家貝克特，藉著作品質疑為何以理性為傲的西方世界竟然發動二次世界大戰，並且對他國犯下非人道的罪行。雖然一般認為荒謬戲劇對西方理性作了最多的質疑，然而其實早在希臘時期，尤里皮底斯就藉著他的悲劇，孤獨地發出對希臘理性文明的挑戰，尤里皮底斯因此被劇評家稱為反動派。但是，他劇中描述的慘況無法被同胞所領悟，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代，尤里皮底斯的觀點卻能引起共鳴。例如，布雷希特或當代文化研究解構的態度，就是在檢審任何文本中的意識形態。因此，本論文以文化研究中與意識形態相關的觀念為主要研究方法，加上背景之分析，以探討尤里皮底斯如何經由他的悲劇，特別是他者的形象，揭露希臘文明中的意識形態。

關鍵字：尤里皮底思、希臘悲劇、意識形態、米蒂亞、特洛伊女人

*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 助理教授
2005.3.1 到稿 2005.5.26 通過刊登



Analyzing the Hidden Ideology in Greek Culture as Reflected in the Images of the Others in Euripides' Tragedy

Ni, Shu-l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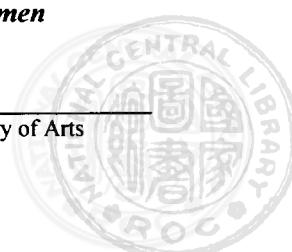
Abstract

Traditional theatre studies usually approach Greek tragedy from a formalist point of view; e.g. using an Aristotelian method to analyze a play in terms of its six elements : plot, character, thought, language, music, and spectacle. Usually, this kind of so-called objective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main ideas of the pla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how Greek culture believes in the positive power of tragedy—to gain a sense of catharsis so that Greek citizens can learn wisdom through suffering. As a result, Greek tragedy is regarded as the epitome of Greek culture, capturing her belief in the positive side of reason, a feature which later on also characterizes Western civilization. However, with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drama, this belief in the reason and the image of noble tragic hero is gradually challenged. For example, in 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 playwright Samuel Beckett questions through his work why a civilization which is so boastful of its reason can start two world wars and commits foul inhumanity on other races. As a matter of fact, Western drama does not need to wait until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question the ironic phenomen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s early as in Greek times, Euripides has uttered a pungent sense of skepticism on Greek ideology. The aim of this paper, therefore, is to examine how Euripides' tragedy reveals the hidden ideology in Greek culture.

Compared with Aeschylus and Sophocles, Euripides is the least welcome and the most discredited playwright. In the plays of the former two dramatists, the Greek world is pictured as governed by poetic justice and the power of the rational Apollo will finally triumph. However, Euripides' plays portray a decaying Greek society where irrationality dominates and his contemporaries are not ready to accept such a shocking fact. Euripides definitely has a very different view on Greek culture compared with Aeschylus and Sophocles. Critics therefore call Euripides 'the crack-up playwright.' His plays do not deal with Greek gods or the noble tragic heroes. Instead, his plays are full of the pitiable images of foreigners who have to face their misfortunes caused by the Greeks. As a result, Euripides' tragedy is a protest against the Greek society, a view which cannot be appreciated by his contemporaries. Nevertheless, more recent dramatists can share Euripides' insight. Bertolt Brecht, for example, encourages his audience to examine what looks most natural in one's society and challenges the status quo. Specifically speaking, such belief resembles contemporary deconstruction attitude in some literary theories, such as cultural studies which are related to examining ideology behind certain social facts.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adopt related ideas on ideology to examine how some of Euripides' plays can reveal the hidden ideology in his Greek society.

Key words : Euripides, Greek tragedy, ideology, *Medea*, *Trojan Women*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Graduate School of Performing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希臘文明中的意識形態 —論尤里皮底思的悲劇與他者形象—

倪淑蘭

1. 前言

希臘文化一向被視為西方文明的重要起源，其中不少的藝術與文學作品捕捉當時輝煌的情境。以戲劇而言，埃斯克勒斯（Aeschylus）與索福克里斯（Sophocles）的劇作崇尚人的理性與宇宙間的正義，呈現出的希臘文明是一致而理性的。黃金時期的希臘展示出：「充滿自信活力的年代，無論在政治、智識或藝術上都睥睨全世界，似乎雅典人沒有什麼是做不到的」（Burian 1985：5）。¹然而弔詭的是，希臘文化雖然耀眼，但實際上希臘的黃金時期僅維持短短數十年（約 479-431 BC），這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為何希臘以及西方世界所引以為傲的理性文明與成就卻曇花一現？更何況，希臘的歷史充滿不斷的戰爭，最後且由斯巴達接管。這當中的弔詭猶如二十世紀荒謬戲劇所反諷的西方文明，為何宣稱進步與理性的文化卻發動兩次世界大戰。雖然目前戲劇研究大都以荒謬戲劇作為批判西方理性的代表作品，事實上，早在希臘劇作家尤里皮底思（Euripides）所刻化的希臘世界，就開始質疑文明中的荒謬性，也無怪乎他被喻為最「現代」的劇作家。他作品當中的思維無疑是較接近現代戲劇中的荒謬戲劇、甚至是布雷希特的奇異化觀點，不輕易接受文化當中的必然，而是批判必然當中的不合理。而這樣的態度也猶如當代文化研究思想中解構的態度，質疑文化中的霸權與意識形態。例如與埃斯克勒斯和索福克里斯相較起來，尤里皮底思底下的人物不是高貴的神祇與君王，而是希臘城邦中的他者：女性、異國公主、亡國奴等等。這些角色不是希臘社會所保護的市民，而是流離異鄉的他者，對照出希臘文明中的矛盾與荒謬性。因此本

¹ 本篇論文參考之資料大多為英文，引用於文章中的中文皆為研究者本人所翻譯。



論文以當代文化研究中的意識型態相關論點為主要研究方法，再參照當時的社會背景，以檢審尤里皮底思悲劇當中的他者形象如何揭露希臘文明中的意識形態。

2. 作品背景

尤里皮底斯在生前是希臘三大悲劇家當中最不得志的一位。他的悲劇甚少得獎，也不受到當時觀眾的歡迎。埃斯克勒斯和索福克里斯的劇作頌揚太陽神阿波羅的理性光明，尤里皮底思卻揭露光明與理性之下的黑暗。他的《米蒂亞》（*Medea*）、《西波里塔斯》（*Hypolytus*）、《奧瑞斯提斯》（*Orestes*）所呈現的是：「分裂的城邦，一個失序的宇宙，預示了雅典想要創造的世紀夢想將轉成惡夢。」（Burian 1985：6）尤里皮底思的悲劇誠實地反映出他所處的社會，然而這樣的觀點卻得不到共鳴，反而卻震驚了他的同胞，因為他們沒有這樣的洞見：「他們不認識自己身處世界的真相，他們更無法想像將來他們的子孫會活在什麼樣的世界。」（Burian 1985：5）尤里皮底斯的悲劇猶如卡珊德拉（*Cassandra*）的預言，²不被他們的同胞所採信。然而他所記載的是他生命中最痛苦的年代，事實上，他的一生見證了希臘的盛況與衰敗，經歷過以下幾個主要事件：「雅典城的崛起、在撒拉米斯（Salamis）大勝波斯、成立德里安聯盟（the Delian League）、聯盟擴大成為王國、最後敗在斯巴達手下。」（Lafont 1987：6）而這些事件也影響了尤里皮底斯的創作哲學，戲劇學者 Croally 認為希臘不斷處在大大小小的戰役之中，而使得尤里皮底斯質疑這樣的現象起因是希臘人狹隘的思想，Croally 稱之為「雅典人的意識形態」（Athenian Ideology）。然而何謂意識形態？Croally 將之分為以下三種情況：（1）它是一套推動行動的想法、信念與態度；（2）意識形態總是與他者的想法相關，是一套虛幻的價值系統，藉以維持某個族群的優勢；（3）意識形態不是一種哲學，但又比偏見更加有系統（Croally 1994：259）。

² 卡珊德拉為希臘神話人物，是 Priam 以及 Hecuba 的女兒。太陽神阿波羅為贏得她的愛，賜予她說預言的能力。但後來因追求失敗，阿波羅下詛咒，將不會有任何人相信卡珊德拉的預言。



若由以上觀點看來，雅典文化是建構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上，而將自己和其他文化區隔開來，建立許多二分法的社會結構：希臘人／野蠻人、自由／奴役、人／神、男人／女人，而藉由這樣的二分法鞏固雅典男性在社會上的優勢（Croally 1994：46）。據說，連蘇格拉底也慶幸自己的身份：「首先，因為我身為男人，而非禽獸，其次，我不是女人，最後，我是希臘人而非野蠻人。」（Croally 1994：153）Croally 認為在這樣狹隘的觀點所建構的社會組織，將造成社會不正義、戰爭以及殘酷等現象：「古典時期的雅典，藉由公民組織將奴隸在政治與法律上的地位變成自然與（合理化）…並由其他族群竊取權力，代替他們發言。」而尤里皮底斯的悲劇挑戰這種不正義的現象，他認為傳統與習俗並非建立在自然法則之上，而是由人的自私所形成（Hadas 1966：70）。

當世界讚嘆著希臘文化的宏偉時，尤里皮底斯卻如胡適口中的烏鵲，提出相反的論調。他認為希臘的文明是建立在少數人的意識形態上，而這些少數人犧牲了大多數人的福祉，也因此尤里皮底斯不認為希臘文化能一致地代表希臘人民全體的精神，他的悲劇企圖將希臘人從這樣的幻覺中喚醒。Croally 認為尤里皮底斯的悲劇所批判的正是「雅典男性公民的意識形態」。（Croally 1994：43）正如戲劇人類學家 Victor Turner 所說：「一個社群的表演能夠深入探索該團體的弱點，使其領導者將他們最珍視的價值觀去神聖化，並尋求替代之道。」（引用自 Croally 1994：13）而尤里皮底斯的悲劇正是批判希臘人所引以為傲的價值觀。本論文接下來將以希臘當時的社會結構、政治、與經濟情況等背景因素分析 Croally 所謂的「雅典人的意識形態」如何反映在尤里皮底斯的悲劇當中，特別是由劇中他者的形象勾勒出來。

2.1 社會結構：當時的希臘人口主要分成以下兩大類

- (1) 公民（約 43,000 人）公民包含所有二十一歲以上男性，父母是自由的雅典公民。他們享有政府所給予的權力，每位公民在法律前一率平等，並享有參與制定法律與管理城邦的特權，而公民主報的是負責政府的開銷與擔起保護的責任。



(2) 非公民的人口不具有投票權，含以下各種人民： 285,000 外國自由人士、 115,000 奴隸、以及其他人士 130,000；而所謂的其他人士包含希臘婦女在內。 (Horton & Hopper 1984 : 105-6)

由以上的資料顯示，全體希臘人口當中大約只有少數的六分之一人口有資格成為公民，而由他們決定所有人的命運，並且享受社會的特別待遇。因此，後世所稱讚的民主制度其實是少數人的特權，同時，也能看出雅典的男性如何自二分法的社會組織中控制他者，並且從中得利。而他們也將這種心態延伸至外交事物，將其他城邦視為野蠻人，也將發動戰爭視為理所當然。

2.2 政治與經濟因素

Croally 認為荷馬的史詩《伊里亞德》對戰爭的頌揚是反應希臘人意識形態最佳的例證，戰爭被刻劃成：「人類最極致的經驗，勇氣在其中展現，並從此英名不朽。」他同時認為戰爭為希臘人而言，也是個測試，能證明一個文化的優越性。(Croally 1994 : 50)也因此，當鄰近聯盟不對其進貢或威脅其主導權時，雅典會毫不猶豫發動戰爭，這當中除了反映優越感之外，還有實質的經濟因素：「雅典的主要收入來自海運貿易 … 其勢力範圍涵蓋整個地中海，這也是雅典握有希臘世界海上主導權與成為經濟中心的主要原因，而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領導權爭奪戰使得兩地陷入長達六十年之久的奔羅尼撒 (Peloponnesian) 戰爭。」 (Horton 1984 : 115-6)

而尤里皮底斯的悲劇有不少與戰爭相關，例如《埃色提斯》 (*Alcestis*) 與《米蒂亞》 (*Medea*) 反映出奔羅尼撒戰爭前夕的政治狀態，《祈求的女人》 (*Suppliant Women*) 完成的時間發生 Archidamian 戰役，寫作《特洛伊女人》 (*The Trojan Women*) 、《伊蕾克特拉》 (*Electra*) 時與斯巴達進入半休戰狀態；而《愛奧尼》 (*Ion*) 以及其他的作品寫於 Ion 戰爭時期 (Lafont 1987 : 18-9)。這些悲劇描繪出戰爭如何影響女性、孩童、甚至是男人本身，所勾勒出的希臘世界是黑暗而非理性的。因為篇幅所限，以下僅就《米蒂亞》 (*Medea*) 以及《特洛伊女人》 (*The Trojan Women*) 分析尤里皮底斯劇中的他者如何受到雅典式的意識形態影響。



3. 作品分析

尤里皮底斯有不少悲劇是以女性為主，反映出當時女性在希臘社會的弱勢地位。雖然當時的希臘社會已有所謂的民主制度，但婦女並沒有投票權或其他公民的權力，她們大部分時間是足不出戶，只有在某些宗教場合才得以出門。而婚姻由父母安排，且必須簽下合約，婚後的嫁妝成為夫婿的財產，之後必須遵守丈夫，最糟的情況是他們被當作是性的奴隸而且被視為生產機器（Croally 1994：91）。而《米蒂亞》一劇在許多方面所刻化的女性形象抨擊以上的價值觀與習俗。劇中女主角米蒂亞哀歎女人的命運當是許多希臘婦女的寫照：

米蒂亞：所有具備判斷能力的生物中，算我們女人最不幸。首先，擁有巨額的財富之後，我們必須招贅一個丈夫，為我們的家業找個主人；因為若不物色一個，情況會更糟。找來的男人是好是壞，具有嚴重的關鍵性，因為我們女人不能輕輕鬆鬆就把婚姻甩掉，也不能過分挑剔它。此外，婚後面對新的行為方式和習俗，除非我們出嫁之前已學知如何妥善應對同床的人，否則實在必須具備先知般的能力。倘若我們能將這些事處理得當，丈夫也能與我們和諧同居，輕省地擔負它的責任，生活就很令人羨慕了！若非這樣，勸你還是死掉的好。

（黃郁秀 1991：184）³

在以上的獨白中，米蒂亞細數了女性在婚姻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也對照男人所佔的優勢，因此米蒂亞哀歎：「我倒寧可上前線打三場仗，也不願懷胎一次。」（黃郁秀 1991：184）

尤里皮底斯除了藉由米蒂亞的獨白與遭遇刻劃女性所受的不公義之外，也藉由更激烈的方式批判希臘的父系霸權思想—也就是劇中最受到爭議的米蒂亞手刃親子事件。表面上看來，米蒂亞為了懲罰負心的傑生而殺子，然而若放

³ 引用自黃郁秀翻譯之註解：『在希臘社會中，法律規定的權力，通常只有男人能夠享有，女人的權力是受到忽視的。此外，女人結婚時需要大額的嫁妝，因此，米蒂亞說結婚好像為自己的家業買來一個當家的主人。』黃郁秀（1991：230）



在希臘整個習俗看來，米蒂亞手刃親子的動機可能更為複雜，因此殺子有了更深層的詮釋空間。

如前所述，女性在希臘社會中往往被視為傳宗接代的工具而已，傑生的話充分地表達這樣的意識形態：「假使男人可以經由另一種途徑綿延後代，而女人根本不存在，這對男人不知該有多好，那樣，活著準愜意極了。」（黃郁秀 1991：195）而從另一個層次看來，米蒂亞的殺子對崇尚男性以及窮兵黷武的希臘文明是個象徵性的控訴。Croally 認為：「米蒂亞謀殺親生兒子的舉動，威脅了男性至高無上的優勢狀態，藉由這個舉動她毀滅了…父系傳統的一脈香火傳承。」（Croally 1994：81）米蒂亞的殺子罪行不僅是逞罰傑生的背叛，更是對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待遇寫下最殘忍的控訴。

《米蒂亞》一劇除了抨擊父系霸權的意識形態之外，也批評了希臘人如何將外國人視為他者。例如當米蒂亞責備傑生忘恩負義時，後者反駁：

傑生： 說到你是我的恩人這回事，我倒要辯明給你聽聽！實則你從我這裡所得到的，比你給出來的，多得多。你不必再和野蠻人生活在一起，現在，你住在希臘，學會了文明的方式，按照法律過活，不必屈從暴力的意旨，而且，所有的希臘人都稱讚妳是聰明的女人，倘若你現今仍住在世界的邊陲，沒有人聽聞過你，你能獲得這項美譽嗎？

（黃郁秀 1991：194）

言下之意，傑生認為米蒂亞應該感謝他將她帶到文明之地，也充分表達希臘人面對他者的優越感。Hadas 認為藉由此劇，尤里皮底斯批判了希臘社會一向認為理所當然的價值觀。例如，為何希臘男性享有各種個人尊嚴，而米蒂亞身為女人並且是外國人，因此被剝奪這樣的權力？以上各段顯示出，當《米蒂亞》一劇由社會背景切入時，觀眾與讀者更能了解為何米蒂亞的殺子悲劇與複雜的社會偏見和意識形態有著密不可分的錯雜關係，必須互文對照。

而女性與外國人身為雙重他者的弱勢形象在《特洛伊女人》一劇中最為悲慘。在該劇中，所有的貴族女性在一夕之間成為希臘男人的情婦或是軍奴。Croally 認為《特洛伊女人》一劇：「是史上最偉大的反戰文獻之一，而它的道德意涵在於（顯示戰爭如一把兩面的利刃），不僅對戰敗的一方具有毀滅



性，對於戰勝國更是全然敗德的舉動。」（Croally 1994：99）。⁴而且該劇在西元 415 年演出時，雅典人正：「蓄勢待發地準備解放 Syracuse 一地，而且雅典人有十足的信心將會戰勝，並且此舉將能充盈國庫。」（Croally 1994：100）尤里皮底斯藉由《特洛伊女人》一劇中婦女悽慘的景象，企圖警告雅典人，喚起他們的良心。尤里皮底斯如此刻劃劇中異國皇族悲慘的他者形象：

卡珊德拉（將自己的貞潔奉獻給阿波羅的處女）將成為亞格豐儂的情婦，賀鳩芭的女兒波琳希娜將服侍在阿基里斯的墳墓旁（其實就是被祭獻的委婉說法）；賀克多的妻子安卓馬凱成為阿基里斯兒子的戰利品，而賀鳩芭本人則成為奧迪賽的奴隸。（Hadas 1966：101-2）

這些原是貴為皇族的婦女，一夕之間國破家亡，面臨親人被殺，而自己也淪落為奴隸的命運。不僅如此，尤里皮底斯在劇中所描述幾個希臘軍人非理性且不人道的舉動和希臘人引以為傲的智慧與文明成為鮮明的反諷。例如，希臘士兵連年幼的小孩亦不放過，將安卓馬凱與賀克多的兒子由高處摔下而死，這樣殘忍的舉動令人質疑希臘文明：「當一個年輕女孩被處死，而原因只是怕她的鬼魂作祟，而同樣的，為了平息更多的鬼魂作祟，而將一個小男孩也從高處活活摔死時，這樣的舉動不禁讓人質疑，人的智力與人性究竟是墮落到了什麼樣的地步？」（Hadas 1966：102）而當安卓馬凱目睹自己親身兒子被摔死的慘況時，她所發出的哭喊是對希臘文明最諷刺的控訴：「噢！你們這些希臘人！你們所發明的這些折磨是多麼的反希臘啊！」（Hamilton 1958：65）

在雅典的黃金時期，埃斯克勒斯與索福克里斯刻劃的是高貴的人物，他們與命運搏鬥，並從痛苦的過程當中學得智慧。他們的神是有理性的智慧之神阿波羅，然而到了尤里皮底斯的劇作時，他的人物面臨的是無理性的混沌世界，而人的痛苦得不到解答，他的神是無法預測、非理性的戴奧尼色斯。終其一生，尤里皮底斯如同神話人物卡珊德拉，他的預言與警告不被他的同胞相信，Croally 如此詮釋希臘人的態度：「當經過奔羅尼撒戰爭所帶來的動亂之

⁴ 括弧中的文字為研究者所加，為使意義更為通順。



後，雅典人需要忘記戰爭所帶來的現實，家鄉因為社會、政治與經濟的改變而困擾，而對外又有外來的威脅，雅典人所面對的人生充滿了焦慮，使得他們無力面對真正的悲劇。」（Croally 1994：251）尤里皮底斯眼見自己的國家從輝煌走向滅亡，他的寂寞也許更接近我們現代人的情況，也就是知識份子的疏離感。（Burian 1985：39）

雖然，尼采認為尤里皮底斯該為悲劇之死負責，他將悲劇型式帶向衰落，也破壞了埃斯克勒斯的宏偉風格與索福克里斯的古典精神。然而他卻開拓了書寫悲劇的另一種視野，他將神話拉向更平實的層次，其中的觀點更接近當代人的思維。他揭發了希臘文明背後不文明的真相—揭露文明如何由父系社會的意識形態，也就是政治與經濟動機所建構，而這也是本篇論文之目的。藉由研究尤里皮底斯的悲劇和今日的觀點產生共鳴，尤其是當今興起意識形態與女性主義的理論，將研究觀點轉向社會中的他者，更能對照出尤里皮底斯前驅的思想，也無怪乎 Croally 認為他是當時最激進的劇作家，也是所有劇作家中最現代的詩人。（Croally 1994：253）

引用書目

- 黃郁秀、曾珍珍合譯。《希臘悲劇》。台北：書林，1991。
- Bickerman, E. J. *Chronology of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 Cornell UP, 1980.
- Brockett, Osar G. *History of the Theatre*. Boston : Allen and Bacon, 1982.
- Burian, Peter. Ed. *Directions in Euripidean Criticism : A Collection of Essays*. Durham : Duke UP, 1985.
- Croally, N.T. *Euripidean Polemic : The Trojan Women and the Function of Tragedy*. London : Cambridge UP, 1994.
- Dunn, Francis M. *Tragedy's End : Closure and Innovation in Euripidean Drama*. Oxford : Oxford UP, 1996.
- Hadas, Moses.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Drama*. New York : Bantam, 1966.
- Hamilton, Edith. *The Greek Way*. Taipei : Bookman, 1958.



- . *Three Greek Plays : Prometheus Bound, Agamemnon, the Trojan Women.* W.W. Norton & Company, 1958.
- Horton, Rod W., and Vincent F. Hopper. *Backgrounds of European Literature.* New York : New York U, 1984.
- Lafont, Susan C. *Politics and Euripides.* Diss. Texas Tech U, 1987.
- Powell, Anton. Ed. *Euripides, Women, and Sexu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1990.

